

对阿根廷堕胎合法化问题的反思

袁梦琪

一、引言

2020年12月30日,阿根廷参议院在经历了超过12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之后,终于以38票同意、29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堕胎合法化的法案(全称为“自愿中止妊娠法案”,Ley N° 27.610, Interrupción Voluntaria del Embarazo)¹。该法案允许女性在怀孕14周内可以自愿中止妊娠,并且可以在任何公立医院中免费接受人工流产手术。此时,阿根廷多个城市的街头被绿色浪潮笼罩,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和成年女性戴着绿色的头巾,拉着绿色的横幅,绑着绿色的手帕,她们拥抱彼此庆祝。² 社交媒体上原本“希望立法”(#SeráLey)标签被“成功立法”(#EsLey)取代,人们欢呼呐喊着口号“合法、安全、自由堕胎”(Aborto Legal, Seguro, y Gratuito)。由此,阿根廷成为了拉丁美洲第一个堕胎合法化的大国。

堕胎合法化法案的通过,代表着阿根廷基层社会运动群体和女性团体政治话语权的胜利,创造了阿根廷女性平权运动中的又一历史性时刻。在更深层次上,为阿根廷未来文化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革铺设了一条道路;政教关系的走向也将呈现新的特征。

这一博弈结果对天主教拥有强大势力的保守拉美地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阿根廷作为现任教宗的故乡,却成为地区领头羊冲击了拉美多国的宗教传统势力和运行准则,代表着新一代进步主义力量的挑战决心。对于其它更多的传统天主教国家,这一事件既具有启发性的意义,也将使社会在这场争论中更加撕裂。

二、阿根廷的生育权抗争史

堕胎合法化法案投票胜出的那一瞬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节点,但却包含了阿根廷历史上无数的社会运动人士、女性组织和母亲们长期不断斗争的心血。

生育权是女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话题,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关于堕胎与避孕的权利。绝大部分宗教团体依据教义认为堕胎是对于婴儿生命的扼杀,将其视为不道德行为。例如,天主教主张把受孕之初的胎儿就看做是人,禁止剥夺胎儿的人权,反堕胎者认为堕胎合法化是对于胎儿生命权的剥夺。在节育问题上,保守的宗教人士倾向于将生育视作个人使命,天主教罗马教皇保罗六世(Pope Paul VI)在1968年的《人间通谕》(Humanae Vitae)中明确禁止了各种形式的避孕行为。现任阿根廷籍罗马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也非常坚定地支持教廷关于禁止避孕的做法,并且认为新生命的到来就是婚姻圣礼的一部分。³ 支持节育者则认为,决定是否受孕是一项基本人权。

天主教在阿根廷拥有绝对的影响力,政教相互牵制使得国会普遍屈从于教廷所支持的“家庭价值”意识形态。阿根廷1921年制定的国家刑法第86条规定堕胎行为是违法的,仅在受孕女性面临健康或精神危险和智力受损女性被强奸而怀孕这两种情况时可以采取堕胎措施;其他堕胎行为均被认为是非法行为,可被判处1—4年监禁惩罚。⁴ 之后,在强力的国家机器和庞大的教会组织的控制下,阿根廷民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不断被干预,自二十世纪7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阶段(见表一)。此后,随着阿根廷天主教教徒的人数不断减少,宗教的影响力在政治场域开始下降。根据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Consej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y Técnicas, CONICET)的报告显示,阿根廷信仰天主教的人口在2008年已减少为总人口的76.5%,与早年相比呈现大幅下降趋势,1947年该数值为93.6%,1960年为90.05%;同时年龄越小信

仰宗教占比越低。⁵这使得阿根廷新政府们能摆脱宗教的束缚，也给民众带来了较大的社会自由度，许多有关性和生育的隐晦问题被放在国家层面进行讨论并得出积极成果。

表一 有关个人生育权利发展的关键节点

年份	主要事件
1968年	天主教罗马教皇保罗六世在1968年的《人间通谕》中明确禁止了各种形式的避孕行为。
1974年	胡安·庇隆(Juan Perón)出台了第659条法令(Decreto 659/1974)禁止公立医院实行任何堕胎手术，禁止药店售卖避孕药具，禁止散播避孕指导信息。 ^a
1977年	豪尔赫·魏地拉(Jorge Videla)领导的军政府颁布法令(Decreto 3938/1977)禁止堕胎。
1986年	劳尔·阿方辛(Raúl Alfonsín)废除了庇隆时期禁售避孕药具的法令(Decreto 2274/1986)，并承诺“民众有选择是否想要生育的自由权利”。成立阿根廷全国女性相遇组织(El Encuentro Nacional de Mujeres)，此后每年就不同议题召开会议。
1988年	成立争取堕胎权委员会(Comisión por el Derecho al Aborto)，致力于为女性群体争取自由堕胎和获取指导堕胎信息的权利。
1991年	阿根廷国会通过第24012号法律—女性配额法(Quota Law)，保证了女性议员参政人数需超过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为女性发声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92年	成立阿根廷女性联合会(Consejo Nacional de las Mujeres)和女性争取选择自由组织(Mujeres Autoconvocadas Para Decidir en Libertad)。
1994年	女性争取选择自由组织阻止了卡洛斯·梅内姆总统(Carlos Menem)企图将严格的反堕胎词句写入宪法的做法。 ^b
1998年	梅内姆政府通过法令(Decreto 1406/1998)成立“未出生儿童纪念日”(Día del Niño por Nacer)传递反堕胎的思想并向教廷示好，双方联合起来向支持堕胎无罪的社会组织施压。
2002年	颁布第25.673号法律，制定了《性健康和负责任生育国家方案》(Programa Nacional de Salud Sexual y Procreación Responsable)，向全民提供性权利和生育权利方面的综合信息，民众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热线获得避孕手段、医疗保健的信息，可以了解对流产、合法中止妊娠的援助。 ^c
2005年	成立争取合法、安全、自由堕胎的全国运动组织(Campaña Nacional por el Derecho al Aborto Legal Seguro y Gratuito)，标志着堕胎权——平权运动小绿巾的初次登场，这一组织领导了之后各个重要的关于堕胎合法化事件。
2006年	阿根廷国会通过第26.510号法律，实行《国家全面性教育计划》(Programa Nacional de Educación Sexual Integral)，该计划旨在保障少年儿童和未成年人在校期间接受性教育的权利，让他们能获得有关性教育的合理信息，学会提高个人性保护意识，从而减少性犯罪事件的发生。

a. 庇隆政府希望能让阿根廷的人口增长到五千万，于是采取了较为激进的鼓励生育的措施；彼时一名阿根廷人如果想要购买口服避孕药，必须持有经过三家医疗机构同意的签字处方才可以得到。

b. 1994年阿根廷宪法改革时，时任总统梅内姆和司法部部长罗多夫·巴拉(Rodolfo Barra)试图将“授予每一个生命以权利，从其形成于母亲的子宫直到生命的结束”一句话加入宪法中，这将会意味着阿根廷公民在怀孕的任何阶段都不可以堕胎，否则就是违宪。

c. 首次实现在国家层面来探讨有关性健康、生育健康的政策，并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

资料来源：见尾注⁶

三、堕胎自由的胜利

堕胎合法化法案的最终胜利通过，分化了一部分政治建制阵营中的社会力量，打击了保守主义支持的势力，完成了新的政治资源分配。

随着基什内尔(the Kirchners)⁷政府对阿根廷人权问题的重视，在2012年有关堕胎的刑法条例得到了一定的修改，因强奸致孕可以合法堕胎的情形也适用于所有正常女性，而不仅局限于智力受损女性。⁸这一修改帮助了那些无钱支付人工流产手术费用、还被迫长期遭受性暴力的女性们，摆脱了疾病或死亡的威胁。阿根廷自1983年以后累计有3000多名女性死于不安全的流产，⁹同时每年约有49000名女性因为秘密堕胎手术导致生病，需要住院治疗。¹⁰2018年，时任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将堕胎合法化法案推至国会，虽然最终未通过参议院讨论，但这也是自2007年向国会提交议案以来，第一次正式进入国会两院层面讨论。¹¹

最后，现任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在2019年总统竞选期间，就曾承诺如果当选则会大力推动堕胎合法化法案的实现（即使他是天主教徒），这是费尔南德斯执政理念中进步主义思想的表现。他认为这一法案的重

点问题不在于是否同意堕胎，而是需要减少因秘密堕胎带来更多的公共卫生相关问题；这是因为在拉丁美洲或阿根廷已经有大量的堕胎案例发生，只是大多数堕胎都是在非专业医疗环境中发生的，从而频繁导致怀孕妇女受伤或死亡。¹²同时，堕胎合法化可以减轻妇女因被动生育而致贫的问题：根据阿根廷卫生部的统计，2018年在阿根廷进行非法堕胎的人均费用约为640美金，¹³而全国所有女性人口中有超过40%的群体没有收入。¹⁴绝大多数被迫堕胎的情况都发生在贫困女性群体中，可想而知她们没有能力承担堕胎的经济费用。堕胎合法化的实行则可以为她们提供免费、安全的手术以及必要的医护措施，也可以为她们避免难以预计的养育孩童的经济负担。这一举措为费尔南德斯赢得了这部分社会群体的支持。

四、先锋还是孤例？

阿根廷的堕胎合法化运动为整个地区带来了解决该社会问题的积极讯号，但是不同国家在未来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政策走势还是难以预测。

堕胎问题在全球范围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社会议题。在拉丁美洲这样一个社会多元、宗教复杂的地区，关于堕胎争论最激烈的矛盾点在于，堕胎是否合法化应该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考虑（减少因为不安全的地下堕胎手术而造成女性死亡现象），还是应该从遵循大多数拉美民众的宗教信仰来权衡（不允许扼杀新生的生命）。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交织着多重复杂的因素，所以拉美社会关于尊重生命（pro-life）还是尊重选择（pro-choice）的争论一直都无法达到完美和解。¹⁵与堕胎相关的法律规定在不同的拉美国家大相径庭：允许自愿堕胎的国家仅有古巴、波多黎各、乌拉圭、圭亚那，其中古巴是拉美首个将堕胎合法化（1965年）的国家，¹⁶此外还有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和瓦哈卡市允许合法堕胎。其余国家均判定堕胎行为非法，其中大部分国家仅允许当受孕者的母体生命受到威胁、强奸致孕或乱伦致孕时才可以向法院申请堕胎，等到申请通过后才能安排医生进行手术，阿根廷此前就属于这一国家类别。最为严厉的国家如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牙买加、海地、多米尼加、苏里南，则是全面禁止堕胎行为的发生；即使出现威胁生命健康的问题也不允许女性选择堕胎，否则将会面临刑事处罚。

阿根廷堕胎合法化法案的通过代表着阿根廷国内进步派的胜利，也激励着其他拉美国家争取堕胎自主权。阿根廷妇女、性别、多样化事务部长伊丽莎白·戈麦斯·阿尔科塔（Elizabeth Gómez Alcorta）在参与中左派组织普埃布拉集团（Grupo de Puebla）的讨论中声称所有的拉丁美洲女性都应该拥有属于她们的权利，并在社交媒体上给自己的谈话贴上了“拉丁美洲改变”（#LatinoamericaCambio）的标签。这一讨论得到了巴西政治家、社会学家埃利奥诺拉·梅尼库西（Eleonora Menicucci）、乌拉圭政治家莫妮卡·哈韦尔（Mónica Xavier）、秘鲁参议员阿依达·加西亚—纳伦霍（Aída García-Naranjo）、智利前总统候选人马尔科·恩里克斯—奥米纳米（Marco Enríquez-Ominami）等的支持，他们均表示将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拉美各国尤其是各自国家对于堕胎合法化的推动进程。¹⁷

然而这股浪潮还是遭受到了保守派势力的打击。阿根廷的天主教会和教徒全力反对堕胎合法化的法案。同时，教皇方济各也曾隐晦地批评费尔南德斯总统的这一主张，他在阿根廷参议院公投该法案的前一夜发表社交言论称“每一个独特而不可替代的生命都是无价的，必须通过言语和行动勇敢地宣布这一点”。¹⁸除了来自宗教势力的指责，其他拉美国家的保守派也强烈反对阿根廷的做法，例如巴西总统贾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阿根廷堕胎合法化法案通过后发表推特强烈抨击阿政府的这一主张，并宣称他绝不会让这项法律在巴西通过。¹⁹在洪都拉斯，政府则在国会积极推动修宪，提高堕胎合法化所需的门槛，意图在法律上设置屏障。²⁰

结语

堕胎合法化法案的通过，既具有重要的现实社会意义，也启发我们对政治发展的思考。

首先，阿根廷有关生育权的斗争史和堕胎合法化问题的讨论，关乎个人对于自身生育选择的决定权，揭示了女性在当代社会对自我权利保护意识的逐渐强化。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阿根廷女性群体及女性运动成功地通过抗争要求社会尊重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利，避免她们因怀孕而陷入社会、法律和经济重压的恶性循环中²¹，这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女性们通过个人的实际行动争取到了她们所认为的真正的权利。

其次，支持合法堕胎的激进群众所说的“将教会从国家中剔除”(Fuera la Iglesia del Estado)和“把你的十字念珠从我们的卵巢中拿走”(Saca tu rosario de mis ovaries)的口号，反映了这些群体在现代核心议题问题上对传统保守势力的抵抗。虽然我们无法预知各国政治保守势力将如何控制局面，但从横向的地区发展角度来看，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话题终将在拉美各地区都引发重要的政治辩论。2021年是拉美的超级选举年，厄瓜多尔、智利和秘鲁都将进行总统选举，阿根廷、墨西哥则将要进行国会选举，有关堕胎和与之相关的矛盾话题，终将在各国带来不可避免的社会对立和动荡，从而影响政局走向。

最后，随着堕胎在阿根廷的合法化，有关这一法案的道德、宗教、伦理讨论将暂告一段落。政府从“政”的角度改善了女性的处境，接下来需要需要从“治”的方面跟进政策的落实和推进。阿根廷作为联邦制国家，想要在内陆省份，尤其是趋于保守的北部省份彻底贯彻、落实该法律政策，想必阻碍重重。同时，政府需要关注公共支出中支付堕胎的费用，医院需要关注各类医疗设备和器具的完善，政策受益者和相关社会组织需要继续跟进堕胎后个人医护问题的解决。对于仍然处于新冠疫情困扰中的阿根廷而言，政府和民众都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未来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将更值得关注。

袁梦琪，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社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研究国家和区域为阿根廷和拉美。

- 1 该法案此前在12月11日以131票赞成，117票反对通过阿根廷众议院的讨论。
- 2 根据争取堕胎合法化的组织者和人类学家米兰达·贡萨雷斯·马丁(Miranda González Martin)的解释，在阿根廷紫色代表女性运动，橙色代表教堂，红色代表左翼政党，蓝色代表正义主义力量。为了区别于其他的组织和一般的女性运动，可被选择的绿色成为堕胎合法化的标志色，绿方巾成为该运动的标志物；蓝色则是反对堕胎合法化的标志色。
“Aborto: ¿Qué simboliza el pañuelo verde?”, *La Nación*, (Marzo 6, 2018), <https://www.lanacion.com.ar/sociedad/aborto-que-simboliza-el-panuelo-verde-nid2114538/>.
- 3 教皇也强调了鼓励生育、禁止避孕并不是让民众都如同“兔子”一样多产，而是应该保有成为父母的责任心。“Pope Francis: No Catholic need to breed like 'rabbits'”, *BBC*, (January 19, 2015),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0890989>.
- 4 “Acceso al aborto en Argentina: Informe conjunto Examen Periódico Universal Argentina Tercer período”, *Fundación para Estudio e Investigación de la Mujer*, (September 30, 2020), <http://feim.org.ar/2020/09/30/acceso-al-aborto-en-argentina-informe-conjunto-examen-periodico-universal-argentina-tercer-periodo/>.
- 5 Fortunato Mallimaci, Verónica Giménez Béliveau, Juan Cruz Esquivel and Gabriela Irrazábal, “Society and Religion in Transformation. Second National Survey on Religious Beliefs and Attitudes in Argentina”, *Research Report No. 25*, 2019, Buenos Aires: CEIL-CONICET, p. 15.
- 6 Jonathan Kandell, “Argentina, Hoping to Double Her Population This Century, Is Taking Action to Restrict Birth Contro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74), <https://www.nytimes.com/1974/03/17/archives/argentina-hoping-to-double-her-population-this-century-is-taking.html>; Barbara Sutton and Elizabeth Borland, “Framing Abortion Rights in Argentina's Encuentros Nacionales de Mujeres”, *Feminist Studies*, Vol. 39, No. 1, 2013, pp. 194-234; Susana Torrado, *Procreación en la Argentina. Hechos e idea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de la Flor, 1993, p. 278; Mala Htun, *Sex and the State: Abortion, Divorce, and the Family under Latin American Dictatorships and Democracies*, Cambridge, U.K.;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62; “Decisions Denied: Women's Access to Contraceptives and Abortion in Argentina”, *Human Rights Watch*, (June 15, 2005), <https://www.hrw.org/report/2005/06/14/decisions-denied/womens-access-contraceptives-and-abortion-argentina>.
- 7 此处的基什内尔政府指阿根廷此前的分别以内斯托·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为总统的两届政府。
- 8 “F., A. L. s/ medida autosatisfactiva”, (March 13, 2012), <https://www.mpd.gov.ar/users/admin/FAL.pdf>.
- 9 Katy Watson, “Argentina abortion: Senate approves legalisation in historic decision”, *BBC*, (December 30, 20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55475036>.
- 10 这一数值被认为是低估了，因为秘密堕胎往往难以得到准确的数据。Amy Booth, “Argentina votes on bill to legalise abortion up to 14 weeks”, *Lancet*, 391(10138), 2018, pp. e21-e22.
- 11 Barbara Sutton and Elizabeth Borland, “Abortion and Human Rights for Women in Argentina”,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Vol. 40, No. 2, 2019, pp. 27-61.
- 12 Román Lejtman, “Alberto Fernández jugó fuerte a favor del aborto y se anotó un triunfo político que excede al Frente de Todos”, *infobae*, (December 30, 2020), <https://www.infobae.com/politica/2020/12/30/alberto-fernandez-jugo-fuerte-a-favor-del-aborto-y-se-anoto-un-triunfo-politico-que-excede-al-frente-de-todos/>.
- 13 Adolfo Rubinstein, “Aportes desde el Ministerio de Salud al Debate sobre la Ley de IVE en el Honorable Senado de La Nación”, (July 24, 2018),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3PzujIbnTWJ7N-CAQfFrspMMnFG_/view.

- 14 “Evolución de la 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EPH), Cuarto trimestre de 2018”, Vol. 3, No. 2, Trabajo e ingresos, INDEC, 2018, p. 6.
- 15 Faúndes Aníbal and Barzelatto José, *El drama del aborto: en busca de un consenso*, Buenos Aires: Paidós, 2011, p. 272.
- 16 Danièle Bélanger and Andrea Flynn, “The Persistence of Induced Abortion in Cuba: Exploring the Notion of an ‘Abortion Culture’”,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Vol. 40, No. 1, 2009, pp.13-26.
- 17 “Exitoso VI Taller del Grupo de Puebla Abordó los Derechos Sexuales y Reproductivos con Líderes y Lideresas de Nueva Países”, Grupo de Puebla, (Febrero 13, 2021), <https://www.grupodepuebla.org/exitoso-vi-tallerdel-grupo-de-puebla-abordo-los-derechos-sexuales-y-reproductivos-con-lideres-y-lideresas-de-nueve-paises/>.
- 18 <https://twitter.com/Pontifex/status/135513862888870913>.
- 19 Translated Cassy Dias, “Bolsonaro Criticizes The Decision in Argentina and Says Abortion Will Never Be Approved in Brazil”, *Folha de S. Paulo*, (December 31, 2020), <https://www1.folha.uol.com.br/internacional/en/world/2020/12/bolsonaro-criticizes-the-decision-in-argentina-and-says-abortion-will-never-be-approved-in-brazil.shtml>.
- 20 “Aborto en Honduras: el Congreso blinda la prohibición absoluta del aborto para impedir su legalización”, BBC, (January 21, 2021),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55760365>.
- 21 在拉丁美洲，广泛存在的性暴力或性侵犯事件使得低龄女孩怀孕事件层出不穷，其中十四岁以下女孩的“被动怀孕”是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议题。在厄瓜多尔，每天都有约7名14岁以下的女孩因为遭受性暴力而被迫生产；在墨西哥，60%的性暴力违法案件涉及到幼龄少女或熟人作案；在危地马拉，许多学龄女孩们辍学的首要原因是意外怀孕，2014年该国公共卫生部统计数据有5100例新生婴儿的母亲年龄在10到14岁之间；在秘鲁，每年20岁以下生产的女性有5万名左右，其中14岁以下生产的女孩超过1千名，意味着每天都有3、4个小女孩就这么懵懵懂懂地当上母亲。
Ximena Casas, “They Are Girls, Not Mothers”,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Vol. 21, No. 2, 2019, pp. 157-168.

《区域观察》	
<p>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1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205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p>	<p>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杨崇圣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高良敏、傅聪聪</p>
<p>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p>	